

# 蘇聯及東歐情勢與對我之影響



畢英賢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兼國際共黨組召集人）  
洪茂雄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兼國際共黨組副召集人）

## 壹、前言

蘇聯的改革及去年以來（一九八九年內）東歐急遽變化，已使東西方相對關係和國際局勢發生了變化。新的形勢對我國必然發生一定程度的影響。本文旨在研析蘇聯和東歐當前情勢及其演變趨向，檢視這些情勢對我國所產生的直接和間接影響。

## 貳、蘇聯情勢及其影響

### 一、蘇聯情勢

一九八〇年代上半期，蘇聯因（一九七九年底）出兵侵佔阿富汗，在外交上陷於孤立；在政治上，因老人政治而僵化保守；在經濟上，停滯不前而瀕臨經濟危機。整個蘇聯社會一片死寂，但不安因素却始終存在。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巴契夫（M.S. Gorbachev）脫穎而出繼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成為蘇聯最高政治領導人物。他就任後即誓言改革和加速經濟發展。

起初，戈巴契夫改革的主要目的在克服蘇聯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的現象，創造可靠而有效的功能結構以加速蘇聯的社會與經濟發展。稍後，他發覺，僅在經濟領域進行改造，很難收到預期的效果。於是，他決定同時進行政治改革，在社會主義體制內給予人民最大限度的民主，使人民覺得自己就是這個體制的主人和創造者。<sup>①</sup>

註① 真理報（Pravda），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頁11。

戈巴契夫執政已歷五年，蘇聯的經濟情況未曾好轉，消費市場反而日益緊張；社會秩序失控，民族問題層出不窮。另一方面，在政治體制改革與民主化方面，近一兩年來却有明顯的成就。

一國的外交政策乃是其內政的延長。蘇聯在內部進行改造（Perestroika）、公開性（Glasnost）與民主化的同時，在對外政策與行爲上也作出了急轉彎。蘇聯以新政治思維爲基礎的對外政策，不僅使東西關係發生了戲劇性的轉折，也使東歐共黨政權爲之土崩瓦解，國際局勢呈現出新的面貌。在國際局勢的劇變之中，幾乎全世界每一個國家皆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了影響。我國自不會例外。

以下從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四個層面，檢視蘇聯當前的情勢。

### (一) 政治情勢

蘇聯共黨於一九八八年第十九次黨代表會上決議，從事政治體制改革以落實民主化。去（一九八九）年，蘇聯首次舉行民主式的選舉，選出首屆人民代表，進行最高權力結構的改造。今（一九九〇）年初，蘇共中央正式放棄權力壟斷，容許其他政黨存在。然而，蘇聯政治改革的過程充滿困難與險阻，其中最嚴重的是加盟共和國的獨立運動與黨內分裂傾向。茲分別分析於後：

1. 政治體制改革，民主政治的基礎已奠定：這方面有三個最主要的改革，第一是設立「全蘇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是改革蘇聯最高蘇維埃，使其成爲常設專任立法機構；第三設立總統制。

按照蘇聯憲法（增修本），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是蘇聯最高權力機構，②每年召開一次，必要時可召開臨時會議，其獨有權力包括：通過和修訂蘇聯憲法，確定國家疆界，選舉最高蘇維埃及最高蘇維埃主席，及批准蘇聯部長會議主席之任命等。一九八九年春，全蘇聯選出二千二百五十名人民代表；五月，蘇聯首屆人民代表舉行第一次大會。大會首先選出戈巴契夫爲最高蘇維埃主席（國家元首）。按照增修憲法，「最高蘇維埃主席」的權力比以往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大出甚多。因此，當戈巴契夫當上最高蘇維埃主席後，其權力基礎開始由蘇共中央總書記轉向國家元首。

新制最高蘇維埃與舊制大不相同。舊制的最高蘇維埃類似目前的人代會；新制最高蘇維埃則近似西方的國會。因此，當新制最高蘇維埃選出與開始運作後，蘇聯的民主與法治已初具基礎。

前述制度確立後，由於最高蘇維埃代表缺乏議會文化與議事經驗，因此效率不高；同時，作爲國家元首，戈巴契夫權力

註②

「關於蘇聯憲法與補充法律」，真理報，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日，頁一至二。

也還有限，掣肘頗多，難以解決當前困難。今年三月中旬，蘇聯人代會通過另一次修憲案；<sup>③</sup>建立總統制並容許多黨並存。同時，戈巴契夫當選首屆總統。蘇聯總統的權力與美國及法國總統相似。蘇聯總統制的設立不僅使立法權與行政權分開，而且使黨、政功能分離，使蘇聯政治體制步向制度化，強化了政治民主化的基礎。

2. 蘇共放棄權力壟斷，容許多黨制：蘇聯憲法原規定，蘇共是蘇聯社會的領導與指導力量。今年修改後的憲法則規定，蘇共、其他政黨及社會組織通過其人民代表蘇維埃及其他形式參與國家政策的制定與國家及社會事務的管理。<sup>④</sup>易言之，蘇共已放棄一黨專政，容許多黨並存；不過，蘇共當局宣示，將全力爭取執政機會。事實上，在一九九〇年年初之前，蘇聯的多黨體制已事實存在。首先，在各加盟共和國和若干自治共和國皆已組成「人民陣線」，有些加盟共和國的人民陣線直接組成了獨立運動。早在一九八八年夏，蘇聯已成立「民主同盟」，以在野黨自居。去年，在人民代表之間組成了「人民代表區際團」，主張急進改革。此外，尚有「自由民主黨」與「基督民主黨」。五月初，「俄羅斯社會民主黨」在莫斯科正式成立。至目前為止，各非共黨派勢力皆很小，意見分歧，整合不易。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蘇共執政黨的地位不易動搖。

3. 當前的政治難題：蘇聯總統戈巴契夫所面臨的難題不少，但其中最棘手的有兩個。一是若干加盟共和國爭取獨立；一是黨內分裂。

目前，已經宣布獨立的是波羅的海濱的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其中，立陶宛首先發難，戈巴契夫一方面利用軍力示威和經濟制裁，迫使立陶宛取銷獨立；另一方面，同意加盟共和國獨立，但必須依照「關於處理加盟共和國脫離蘇聯有關事務的程序法」，<sup>⑤</sup>進行全民投票。如投票人數的三分之二贊成獨立，方可脫離蘇聯。但是，這些共和國並不願如此。因此，加盟共和國獨立問題至今尚無妥善的解決之道。除了前述三國外，亞美尼亞、亞塞拜疆、喬治亞及莫爾達維亞等共和國也已表現了強烈的獨立意向。戈巴契夫一旦鬆手，蘇維埃聯盟將遭到分崩離析的命運。

關於蘇聯共黨的分裂，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若干共和國的共產黨（如立陶宛共產黨、愛沙尼亞共產黨、拉脫維亞共產黨等）宣布脫離蘇聯共產黨而獨立；另一方面是蘇共內部的分裂。前者與民族問題有關，此處不專述。目前，蘇共內部紛紛出現不同意見的派系。其中有兩個最大派系，一是「蘇共民主綱領」派，主張急進改革；一是「馬克思主義俱樂部聯盟」，屬於保守派。今年二月，蘇共中央公布了新「黨綱」<sup>⑥</sup>後，「民主綱領」派與「馬克思俱樂部聯盟」也先後提

註③ 「蘇聯憲法」（一九九〇年增修本），第二七條，真理報，一九九〇年三月十六日，頁三。

註④ 同註③，頁一。

註⑤ 真理報，一九九〇年四月七日，頁五。

註⑥ 「邁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二十八次黨代表大會的綱領）（草案），消息報（晚版）（Izvestiya），一九九〇年一月十三日，頁一至三。

出了自己的綱領。⑦兩派各執一端，差異頗大，在黨內引起重大的鬭爭，如不能妥協，可能引起蘇共內部的分裂。蘇共一旦分裂，整個局勢將會改變。

## (一) 經濟情勢

蘇聯實施經濟改造已歷五年，經濟情況每下愈況，去年蘇聯經濟情況是戈巴契夫執政以來最差的一年。因此，蘇共正力圖振作，克服困難，準備激化經濟改革。

1. 經濟現況：按照今年初蘇聯官方所公布的文件，蘇聯全國的經濟情況依然很困難，消費市場的緊張業已升高，經濟發展動力下降。在過去一年內，很多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要計畫指標皆未完成。與前年比較，蘇聯的工業生產祇成長百分之七，農業生產成長百分之二。⑧據美國中情局報告，蘇聯消費品嚴重缺乏，在一千二百種日用必需品中，祇有五十種不虞匱乏。導致經濟惡化的原因頗多，而社會與種族動亂是最直接的原因。⑨事實上，蘇聯今年前兩個月的工業生產不進反退，分別下降百分之二·二與一·六。⑩因此，美國情報機構預測，蘇聯今年的經濟情況不會好轉，最大可能是停滯不前或輕微下降，通貨膨脹壓力與日用品缺乏皆難以消除。⑪

2. 困難所在：蘇聯經濟改革計畫不善，除了受到原有過份中央集中規劃與官僚制度的影響外，也受到天然災害、種族紛爭及工人騷動等影響，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有三點：官僚體制、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社會失序。

基本上，蘇聯的經濟改革是由上而下的，儘管上層領導大多表示贊成，但是愈向下層，阻力愈大。在很多地區，惰性相當強烈。例如，有兩種人最保守，一是經濟領導幹部，一是半技術、半專業性人員。後者擔心，在改造中他們不能再濫竽充數，將被淘汰而失業；前者則擔心失去領導權威。⑫很多工人安於現況，不必競爭，不必勤勞的日子，對改革的興趣也不大。

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是蘇聯當前經濟重大難題之一。根據蘇聯政府的報告，一九八九年內，蘇聯的國債達四千億盧布（

註⑦ 分別載於真理報，一九九〇年三月三日，頁三；及四月十六日，頁四。

註⑧ 「蘇聯國家統計委員會通報：一九八九年蘇聯社會經濟的發展」，真理報，一九九〇年一月二十八日，頁二。

註⑨ 英文中國日報 (The China News)，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二日，頁七。

註⑩ 「面對陡梯」，蘇聯政府公報 (Pravdystvenny Vestnik) (週刊)，第十五期 (一九九〇年四月)，頁一。

註⑪ 同註⑩。

註⑫ 消息報週刊 (Nedelnya)，第十四期 (一九九〇年)，頁二—三。

約值六千七百億美元元)，政府預算赤字九百二十億盧布（約值一千五百三十億美元元）；<sup>⑭</sup>一九八九年初，蘇聯外債達三百四十億盧布（約值五百六十七億美元元）。<sup>⑮</sup>國債包括政府債券（由人民持有者）、國家保險局保險單（人民付出保險金）和政府向全國基金的借款；蘇聯預算帳面收入包括這三項。歷年來，蘇聯不斷發行公債與政府赤字劇增，使蘇聯國債每年遞增，負擔愈來愈重。

另一方面，人民儲蓄與工資持續增加，消費品供應不足，使通貨膨脹壓力有增無減，盧布幣值相對低落。近期內，蘇聯當局若無法控制物價和工資增幅，整個經濟改革將更加困難。

3. 經改方向：去年，蘇聯表示要「加速經濟健康化」；最近，蘇聯當局聲言，要激化經濟改革。這個極端經濟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實行計畫市場經濟。所謂計畫市場經濟即是西方和已發達亞洲國家所實施的一種制度。在這一制度下，政府指導國家經濟的發展，但容許市場力量發揮極大的調節作用。為此，蘇聯最高蘇維埃已通過了「所有制法」、「土地法」、「承包制法」。在這方面，蘇聯所面臨最大的挑戰是物價改革。若不實行徹底的物價改革，使符合市場經濟，則一切改革純屬罔然；若進行物價改革則可能造成更大的通貨膨脹，使業已困難的經濟在短期內更加惡化。這是經濟改革中的一個險關，戈巴契夫或早或晚不得不鼓起勇氣全力以赴。

### (三) 軍事情勢

蘇聯的軍事力量僅次於美國，在若干方面可能超過美國。毫無疑問，蘇聯之所以成爲超強之一，並不是由於其經濟實力，而是它有強大並具有威脅的武裝力量。在國內政治上，蘇聯軍方雖然沒有太大的發言權，但在緊要關頭却能左右大局。戈巴契夫改革開始後，軍方起初很少表示異議，但當蘇聯境內民族問題紛紛出現，社會秩序逐漸失控之時，軍方的聲音日漸升高，對改革過程也提出了不同意見，尤其在軍事改革方面不斷表達了不同的看法。

1. 軍力概況：蘇聯現有總兵力爲三百九十九萬三千人（美國爲二百二十二萬四千九百人）；在戰略武器方面，蘇聯洲際彈道飛彈有一千三百九十八枚（美國一千枚），潛水艇發射飛彈九百二十四枚（美國六百零八枚），長程轟炸機一百六十二架（美國三百二十四架）。<sup>⑯</sup>蘇聯已決定，在一九九一年之前，裁減兵力五十萬與相應裝備（坦克一萬輛、砲八千五百門及戰

註<sup>⑮</sup> 同註<sup>⑭</sup>。

註<sup>⑭</sup> 消息報，一九八九年八月五日，頁三。

註<sup>⑯</sup> 蘇聯資料引自真理報，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六日，頁二；美國資料引自軍力平衡——一九八九—一九九〇（*The Military Balance 1989-1990*）（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一九八九年），頁一六。

蘇聯及東歐情勢與對我之影響

圖機八百架)。同時，美蘇雙方已原則同意，各削減核子攻擊武器百分之五十。

去年蘇聯首次較詳細地公布軍事預算。一九八九年軍費總計為七百七十三億盧布(約值一千二百餘億美元)，約等於國民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二。這數字仍低於西方的評估。今年，蘇聯軍費為七百零九億七千五百八十萬盧布(約值一千多億美元)，較一九八九年下降百分之八。二；預計一九九一年，蘇聯軍費將再減少百分之十四。二。<sup>16</sup>軍方對此甚表不滿。

2. 軍方意見：在改造過程中，軍方對很多問題有不同意見。今年二月，蘇共中央公布新黨綱草案後，蘇聯總參謀長莫衣賽耶夫(M. Moiseev)批評說，該黨綱對重大國際問題缺乏注意。同時，他表示，該綱領不僅未充分反映蘇聯軍隊對國家安全的貢獻，反而矮化它的角色，試圖使軍隊孤立於蘇聯人民之外。<sup>17</sup>此外，蘇聯軍方對很多問題有意見，茲列較重大者於後：

第一，對威脅評估，軍方有不同的看法。按照戈巴契夫的新思維，外來軍事威脅業已降低。但是，蘇聯軍方不以為然。他們認為，西方聯盟仍舊是對蘇聯安全的嚴重威脅。他們下結論說，不僅美國在繼續追求凌駕於蘇聯的戰略優勢，而且「反動的力量」並未放棄擾亂國際局勢的作為，尤其在社會主義國家中。<sup>18</sup>

第二，關於裁軍問題，軍方傾向保守。由於對威脅評估的不同，軍方在裁軍問題上的立場也傾向謹慎和保守。軍方認為，應由軍事專家考慮軍事事務，而目前蘇聯政府所執行的片面裁軍已破壞了蘇聯的安全。甚至，蘇聯總參謀長莫衣賽耶夫警告說，在裁軍方面勿蹈赫魯雪夫的覆轍。<sup>19</sup>

第三，關於大量削減軍費，是否正確，軍方存疑。基於前述立場，軍方對戈巴契夫連續大量裁減軍費不表贊同。他們反對一種說法，那就是，蘇聯經濟不好是由於軍費負擔過重。他們認為，那是其他不當措施所造成的。

3. 軍事改革：目前，蘇聯軍事改革的基本方向有三。第一，進行全面國防改革，嚴格配合蘇聯現行國家與安全政策，尤其是以「防衛性軍事準則」與「合理可靠的足夠」原則為基礎。第二，以集約化的、重質的途徑，取代粗放的、重量的途徑執行國家任務。第三，軍事生活實施全面的與深刻的民主化。<sup>20</sup>

註<sup>16</sup> 真理報，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二日，頁四。

註<sup>17</sup> 紅星報(Krasnaya Zvezda)，一九九〇年二月十日，頁一。

註<sup>18</sup> 在列寧主義的旗幟下(Pod Znamemem Leninizma)，第二期(一九九〇年)，頁三；引自蘇聯報導(Report on the USSR)，第十一期(一九九〇年)，頁一~二。

註<sup>19</sup> 「再論軍隊的威望」，武裝力量共產黨人(Kommunist Voorzhenykh Sid)，第十三期(一九八九年)，頁三~四；蘇聯報導，第三十五期(一九八九年)，頁三五~三六。

註<sup>20</sup> 「訪問國防部長亞佐夫：保衛人民的安全」，真理報，一九九〇年二月二十三日，頁三。

近來，加盟共和國（如立陶宛）要求建立自己的「地區防衛體系」。蘇聯對此未作任何讓步；蘇聯軍方警告戈巴契夫，決不可接受此項要求。<sup>②</sup>此外，最近蘇聯一些人士大力提倡，以募兵制取代徵兵制。蘇聯軍方堅決反對。今年蘇聯軍人節時，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D. Yazov）再度就此一問題發表意見。他認為，實行募兵制既不能提高戰力，也不能節省軍費，甚至適得其反。<sup>③</sup>按照目前的情況，近期内蘇聯尚不能改行募兵制。

4. 可能發展：蘇聯逐漸削減軍事費用勢所難免，裁軍亦大勢所趨，軍方縱然反對也無法阻止。蘇共對軍隊控制甚嚴，因此將領們無論基於理智、對政府的忠誠以及機會主義的考慮、或對前途和家庭的關切，皆不敢貿然以武力來維護他們的權利或發動政變。軍官中黨員人數依然占百分之七十五，軍中黨組織依然很嚴密，由蘇共中央直接指揮。

戈巴契夫作為蘇聯的總統，也是蘇聯武裝部隊的最高統帥。因此，在他的意志之下，蘇聯軍事改革將大力推行。但是，由於民族衝突、加盟共和國的獨立運動、社會秩序的動亂、以及拒服兵役的人數日漸增加，戈巴契夫不能再忽視軍方的意見。

事實上，軍事力量仍舊是蘇共政權最後的支柱，若將帥們離心離德、軍心渙散，戈巴契夫不僅改革難以繼續，其權力亦將難保。軍方或許無意奪權執政，但是有充分的力量支持戈巴契夫的對手，迫使他下臺。

#### （四）社會情勢

蘇聯知識分子經常使用「政府解體」和「權力癱瘓」來描述當前蘇聯的社會。蘇聯社會秩序惡化在一九八九年特別顯著，其基本原因是，蘇聯國家的政治基本結構，也就是黨組織失去了威望。黨、政官員面對人民的敵意與輕視，又不能訴諸任何鎮壓手段。更糟的是，蘇聯黨政機構，從蘇共中央委員會、國安會（KGB）至地方黨政機關幾乎皆分裂成互不相容的派系。因此，眼看社會秩序失控，無善策以對。蘇聯的社會情勢正處於非常複雜的狀況中，效舉最突出者於左：

1. 民族問題複雜，不易解決：在戈巴契夫的公開性與民主化政策下，以往被壓抑的民族問題紛紛出現。這些民族問題極為複雜，若以管理權分，有下列三大類。第一，若干民族要求恢復自治行政區。史達林統治時期，曾集體放逐若干少數民族並解散他們的自治行政區。這些民族包括伏爾加日爾曼人、車臣人、殷古什及克里米亞韃靼人。第二，少數民族間的土地糾紛。在蘇聯境內，少數民族之間的領土問題也非止一件，但其中最嚴重的是納戈諾·卡拉巴赫自治省（Nagorno-Karaba-

註② 國際先鋒論壇報（IHT），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三日，頁四。

註③ 同註②。

khskava A. O.) 之爭。該省在亞塞拜疆共和國境內，但絕大部分居民是亞美尼亞人。該省與亞美尼亞共和國和國的領土未直接相連接。但是，卡拉巴赫自治省的居民要求與亞美尼亞共和國合併。這就是觸發了亞塞拜疆與亞美尼亞兩個共和國的衝突。這兩個民族由於宗教、文化迥異，向來不和。此一衝突於一九八二年二月開始後，已數度引起流血對抗，但是蘇聯中央至今尚無解決良策。第三，加盟共和國要求獨立。

2. 社會保安失控，影響生產與政治改革：一九八九年內，蘇聯不僅在經濟秩序方面出現紊亂，在社會秩序方面亦出現失控現象。街道上的秩序已逐漸惡化，儘管蘇聯官方加強打擊犯罪措施，但很多類型罪犯的比率不斷升高。去年，蘇聯的暴力犯罪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即使車禍次數也增加了百分之三十。<sup>②</sup> 生產機構的勞動紀律也一落千丈。這些現象沉重打擊蘇聯經濟的運作，也使政治問題難以處理；而這些現象本身也成為戈巴契夫亟需解決的難題之一。

3. 工人騷動，動搖社會根本：蘇聯人民大眾政治活動的水平不斷升高，破壞了蘇聯國家的穩定性，把它推向混亂的深淵。去年夏天，蘇聯煤礦工人罷工，使地方當局無能為力，使中央政府完全順從工人的要求。於是，在秋冬期間，在很多重要城市（如斯維爾德羅夫斯克、伏爾加格勒特、契爾涅夫及頓涅茨克等）相繼發生暴亂。按照蘇聯官方的統計，去年上半年，平均每天有一萬五千人罷工；而下半年的前五個月，平均每天有五萬人曠工。<sup>③</sup>

同時，全國不斷發生向政治秩序挑戰的集會與示威。按照蘇聯官方的資料，今年一月一日至二月二十三日，共有六百四十萬人參加集會，一百多萬人參加示威活動。<sup>④</sup> 戈巴契夫的政治改革已使蘇聯工人有自我表達的權利；而他們也決心加以利用。但問題在於一旦政治改革超前太遠，經濟上的重大改革就會難以推動；而經濟情況如果不獲改善，工人騷動將愈來愈擴大。

4. 人民不滿情緒難以安撫：戈巴契夫論及改革時，一再向蘇聯人民保證，提高生活水平。現在，日用品缺乏與社會秩序失控使人民生活更加困難。本來，戈巴契夫以為一九八九年是最壞的一年，豈知今年首季情況未獲改善，反而惡化，生產直線下降、外債增加，與西方外貿的赤字上升，通貨膨脹率不受控制。<sup>⑤</sup> 一般民衆由失望而不滿。此一情況，近期內並無快速改善的可能。

註② 希拉平托赫 (V. Salapenokh)，「蘇聯秩序的衰退」，基督教科學誠實報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一九九〇年五月七日，頁一九。

註③ 消息報，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四日，頁二。

註④ 同註③。

註⑤ 大公報，一九九〇年四月十日，頁三。



## 二、對我影響

蘇聯內部的改造運動帶動其對外政策的轉變。莫斯科對外政策的劇變對整個世局發生了重大影響。因此，蘇聯當前的情勢對我國產生了間接與直接的影響。

### (一) 從國際佈局看

1. 世界權力結構趨向多極化，有利我國家目標的實踐：由於蘇聯對外政策的轉折，美蘇關係的改善，使國際政治的蛻變加快了脚步。在此之前，國際政治已從壁壘分明的兩極體系轉變為鬆弛的兩極結構。現在，正從鬆弛的兩極體系向多極體系過渡。多極化並非多角色的極端化，而是多元化，使兩個超級大國失去強大的操縱力量。相比之下，兩極對抗容易發生國際緊張；國際權力結構多極化之後，各極不可能都是彼此對立，因而比較能夠相互制衡。這種情況將使世局易維持穩定與和平。

我國當前的主要國家目標是，維護復興基地安全、保持經濟穩定發展、促進民主改革、加速以和平方式統一中國。就其中任何一個目標的實踐而言，一個穩定的、和平的國際環境對我國皆有利。反之，皆不利。

2. 國際共產運動日漸衰退，益增我國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信心：由於蘇聯對外政策的劇變，容許東歐共黨國家有選擇的自由，走自己的道路。於是，東歐各國除了阿爾巴尼亞以外皆已放棄共黨一黨專政、揚棄馬列主義、改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東歐共黨集團實際上已土崩瓦解。西歐共黨的聲勢亦在衰退之中。第三世界共黨顯然已不可能獲得蘇共或中共的積極支助；同時，由於共黨國家的相繼衰退，共產主義已不具吸引力。

中共雖然不肯放棄四個堅持，但在理論上不得不奉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事實上，這是理論上的大退却。在實踐上，中共仍不得不深化經濟改革，擴大對外開放。

我國一向秉持反共政策，國際共產運動的衰退，足證我國政策方向的正確，益增我國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信心。中共的開放政策，緩和兩岸的緊張關係，容許兩岸經貿往來，接納我方投資等，使我國和平統一有望。同時，世界共產主義的總危機已使中共在島內的活動空間大為降低，略減我國的安全顧慮。最重要的是，使兩岸制度的優劣，完全呈現在全中國人之前。

3. 國際經濟秩序趨向集團化，對我經濟發展有利：在國際權力結構趨向多極化之同時，國際經濟秩序正趨向集團化。美國正圖建立一個在美國和加拿大控制下的北美自由貿易區；西歐共同市場將在一九九二年實現統一市場。東歐國家的經濟互

助委員會正在試圖改變體質中，有意使它成爲一個共同市場的形式。日本有意組織東亞經濟集團，但是由於亞太地區情況複雜，有待克服的困難很多，一時難以落實。但是，日本、南韓、中共與蘇聯可能先成立東北亞經濟圈。此外，各大洲尚有較小規模的自由貿易區已經存在或將形成。

經濟集團化將突破各國國內狹小市場，使企業得到較大的活動空間。

對我們以外貿爲導向的經濟言，是有利的。由於兩岸關係的緩和，在未來的區域經濟集團中，中共對我方的排斥將會降低。

### (二) 從區域形勢看

蘇聯對亞太地區的政策，不僅是其整體對外政策的一部分，也是國家經濟政策的一部分。

作爲整體對外政策的一部分，蘇聯新亞太政策的要點是，與所有亞太國家建立與維持友好關係，特別致力於改善與中共及日本的關係。在軍事方面，蘇聯承諾在其遠東地區僅維持最低水平的防衛武力。

作爲國家經濟政策的一部分，蘇聯亟欲與亞太國家展開並發展廣泛的經濟和貿易關係，以促進其遠東與西伯利亞的發展。在遠程經濟發展上，蘇聯一大部分希望寄託這片廣大地區的開發。蘇聯準備在此一地區，建立若干自由經濟區。爲此，蘇聯已草擬了一個開發計畫，其總投資額高達三千二百億美元。<sup>②</sup>

蘇聯的亞太政策對我國至少可產生下列影響：(1)區域安定性提高，衝突逐漸減少，有利我國經濟發展和區域經濟活動。(2)有利我國分散和擴大國際市場。(3)擴大我國在區域內國際投資之機會。(4)在國際活動中，使政治性禁忌逐漸減少。

### (三) 對我直接影響

蘇聯形勢的不變，對我之直接影響如左：

1. 中蘇共關係的改善對我所產生的直接影響：就遠程戰略觀點看，中蘇共關係的正常化對我不利。此一事實使中共可全力對付我國，減少後顧之憂，也使中共對我當面的壓力增加。不過，在目前國際與區域局勢趨向緩和之際，兩岸緊張下降之時，此點尚不致構成立即的威脅。就中近程觀點看，由於中蘇共關係的改善，我國與蘇聯建立經貿關係的阻力已大爲降低。

2. 爲中蘇經貿關係創立先決條件：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我政府宣布，與五個東歐國家（東德、波蘭、匈牙利、南斯拉夫

註② 斯奈德(D. Snieder)，「豐富地區的大計劃：蘇聯遠東已成熟可摘」，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五日，頁二一—三。

及捷克) 採行直接雙邊貿易；兩年後，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也納入直接貿易的範圍。但是，對蘇聯與阿爾巴尼亞仍維持間接貿易。近年來，蘇聯對內實行民主化，對外採取開放政策，因此今年六月我政府取消對蘇聯和阿爾巴尼亞直接貿易的禁令。

3. 給予我國企業界在蘇聯境內投資的可能；起初，我國祇准對蘇聯直接貿易，但維持間接投資。不久，我國政府取消對蘇聯投資的禁令。<sup>②</sup> 雙方將就資本轉移、通信及運輸等問題進行磋商。

4. 非經濟聯繫業已開始：我國與蘇聯方面的往來，並非止於經濟聯繫。蘇聯官員與學者來臺參加國際會議，以及記者來臺訪問已有開端。我國記者到蘇聯訪問(係以觀光簽證前往)也陸續不斷。人民赴蘇觀光已非新聞。

5. 我與東歐關係的蛻變：東歐國家大多已脫離共黨統治，使我與其關係步入蛻變的過程。到目前為止，我與若干東歐國家已籌備商務辦事處；並考慮經援東歐國家，進一步發展雙邊關係。<sup>③</sup>

### 叁、東歐情勢及其影響

#### 一、東歐情勢

戰後，一向被視為鐵幕國家的東歐集團，四十年來在紅色集權的恐怖統治下，自由的火花和民主的幼苗，屢遭踐踏，幾乎難有茁壯的機會。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有不少國家被赤化，而失去自由，但還沒有過由共黨「一黨專政」轉化為多黨民主的先例。可是，一九八〇年代最後半年，在東歐却出現一連串劃時代的變革，而使這些所謂「共黨國家」的原來面貌完全改觀。諸如：一九八九年九月，波蘭經由自由選舉而誕生了東歐第一個「非共」領導的政府；<sup>④</sup> 十月七日，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MSZMP，即匈共本名)，宣布與馬列主義決裂，自行廢黨，改名「社會黨」，<sup>⑤</sup> 更推波助瀾，增強東歐「非共化」的勢頭；十一月九日，修建已達廿八年的「柏林圍牆」突然開放，非但導致東德共黨政權垮臺，而且加速了東西德的統一進程；緊隨東德快速的變革，於十一月十日，保加利亞執政長達三十五年的保共領袖日夫可夫(Todor Zhivkov)也被迫下

註② 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五日，頁二十一。

註③ 中國時報，民國七十九年四月十七日，頁一。

註④ 洪茂雄，「論波蘭民主化的發展」，問題與研究月刊，第二十九卷第三期(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十日)，頁一一一三。

註⑤ 洪茂雄，「論匈牙利政權轉移過程」：一種理性改革模式的詮釋，問題與研究月刊，第二十九卷第八期(民國七十九年五月十日)，頁一一一一。

臺；隨後，捷克斯洛伐克亦引發一場和平革命，捷共領導階層交出政權，平反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sup>②</sup>使得當年改革運動的領導人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奇蹟式的復出，接掌國會議長，而國家元首改由著名異議分子哈維爾(Václav Havel)接任。同年十二月，最令人感到振奮的是，堅持史達林主義的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șescu)政權，儘管控制森嚴，却是不堪一擊，僅僅在一個星期之內即被推翻。凡此種種，東歐這種革命性的變局，非但已在共黨世界產生一波又一波洶湧澎湃的衝擊，而且對戰後東西方形成的秩序結構，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 (一) 變革特點

總的來說，過去一年來，東歐國家的變革，最具體的表徵，可歸納下列數點：

第一、修改憲法：戰後東歐國家，幾乎都抄襲史達林模式的憲法。過去四十年也曾經數度修改，但嚴格地說，共黨政權對憲法的態度，形式意義大於實質意義。一九八九年下半年以來，除阿爾巴尼亞外，所有東歐國家均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憲，並刪除保障共黨「領導地位」的條款，實行多黨民主，使共黨「一黨專政」的時代正式結束。

第二、更改國號：為了顯示獨立自主性，並落實民主化，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和捷克先後更改國名。匈、波兩國把「人民共和國」刪掉「人民」（共黨一向堅持的「人民民主專政」概念），改稱「匈牙利共和國」、「波蘭共和國」；羅馬尼亞則乾脆把齊奧塞斯庫時代所稱的「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改名「羅馬尼亞」；捷克則把其國號「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改為「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南斯拉夫的加盟共和國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亦宣布刪除「社會主義」的官方名稱。這顯示主宰東歐四十年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已被拋入歷史的灰燼中。

第三、共產黨改頭換面：因為共黨聲名掃地，不再得到人民信任，乃紛紛更名。匈共改名「社會黨」，東德共黨改名「民主社會主義黨」，波共改名「社會民主黨」、保共更名為「社會黨」、南斯拉夫境內的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共產黨亦更名為「民主革新黨」，藉此與過去的歷史劃清界線。改頭換面後的社會黨或社民黨，以及改組後的共黨，均另訂新黨綱，放棄列寧式的「民主集中制」，與其他政黨公平競爭，由「革命政黨」轉換為「民主政黨」。<sup>③</sup>

第四、社會運動帶動了民主化：波蘭的「團結工會」、匈牙利的「民主論壇」、東德的「新論壇」、捷克的「公民論壇」

註② 蘇聯、波蘭、東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等五個華約組織成員的領導人，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在莫斯科發表聲明，宣布一九六八年進兵捷克，「是一個主權國家的內政干涉」，此一行動應受譴責。

註③ *Osteuropa*, 1/90, pp. 41-54.

「保加利亞的「生態公開」等，這些團體原是以社會運動為取向的組織，因能有效整合反對力量，終於迫使共黨放棄獨攬大權，而走向政治多元化。這些團體也就順水推舟，扮演了政黨的角色，有效地逼迫共黨和平地交出權力。

第五、政經改革同時進行：其政治改革比經濟改革的步伐更快，剛好與六、七十年代相反；當時東歐國家僅在經濟領域作不同程度的改革。目前經改方向由中央指令性計畫經濟逐漸轉向市場經濟。

第六、開放自由選舉：過去四十年，所有選舉均由共黨一手包辦，現在則有選舉法加以規範，各政黨公平競爭，選民可以自由投票，共黨不再可能操縱選舉。根據民意測驗顯示，改頭換面後的社會黨或社民黨，其得票率均在一〇～二〇%左右，已不可能單獨執政，勢必與其他政黨聯合組閣或扮演反對黨角色。<sup>⑤</sup>

第七、黨政分離：黨的領導人不再兼任國家元首職務，並解散由黨控制的「民兵」或安全部隊，以及不再享有諸如取得國庫補助、佔用公產、壟斷大眾傳播媒體等特權。

## (二) 東歐共黨衰退的主因

此外，在東歐國家民主化進程上，還引人側目者，如共產黨權力結構的調整和黨員大量流失。東歐共黨為適應新形勢，領導核心以主席取代沿用四十年的總書記或第一書記，執委會取代政治局，並解散政府部門、軍隊及企業等工作單位之基層黨組織。<sup>⑥</sup>再者，過去東歐各共黨黨員人數所佔人口比例依次是，羅馬一六點四%、東德一三點七%、捷克一〇點六%、保國一〇點一%、南國九點五%、匈國八點二%、波蘭五點八%、阿國四點一%。<sup>⑦</sup>可是，最近半年來共黨黨員脫黨人數相當可觀，東德、捷克、波蘭、匈牙利等國共黨黨員幾乎有三分之二以上退黨。<sup>⑧</sup>導致東歐各共黨衰退的主因，可歸納下列四點因素：

其一、官僚體制僵化，已無法適應客觀環境的變化，尤其經濟發展受制於意識形態，既不能與自由民主國家競爭，又不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民怨已深，自難獲得人民信賴。

其二、東歐各國民主化的激盪，致使「一黨專政」難以維繫，實行「多黨民主」，乃民心歸向。

其三、戈巴契夫的「改造」和「公開性」政策助長了東歐民主化的發展。

註⑤ *Der Spiegel*, Nr. 11 (12, März 1990) pp. 14-17.

註⑥ *Ost Europa*, op. cit.

註⑦ Richard F. Staar, "Checklist of Communist Parties in 1985," *Problems of Communism* 35, (March-April 1986), p. 65.

註⑧ *Der Spiegel*, op. cit.

其四、東西歐的互動關係，加速了東歐民主化的脚步。西方國家提供資訊和經援，大大地削弱共黨的威權。

## 二、東歐民主化的影響

### (一) 對共黨世界的影響

在八〇年代和九〇年代交替之際，東歐情勢的演變，一直是國際大眾傳播媒體矚目的焦點。毫無疑問地，東歐的變革，已對世界局勢產生深刻的影響，其中對共黨世界帶來的衝擊，尤值得一提者：

其一、社會大家庭的瓦解：隨着共黨「一黨專政」的崩潰，東歐各國的政治發展已相當程度自行其「道」，各奔前程。如何牙利加入「歐洲理事會」；東德大開「門戶」，迎接德國再統一的來臨；捷克和羅馬尼亞頻頻展開「西向政策」。最近波蘭、捷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亞更有志一同，在日內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支持美國提案，譴責古巴迫害異己，令卡斯楚極端不滿，直指東歐國家已背叛了社會主義。<sup>⑳</sup>

其二、國際共運分崩離析：東歐共黨的衰退，說明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違背時代潮流，正走向窮途末路。西歐的「歐共主義」不得不順應「反共民情」，向東歐看齊，已改頭換面，重整旗鼓，樹立新形象，來迎接新生，不致於被民主潮流吞沒。再者，亞洲的外蒙、中東的南葉門、非洲的衣索匹亞、安哥拉、拉丁美洲的尼加拉瓜等馬列主義或左翼政黨也發生了空前的變革。即使始作俑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司令部」的蘇共，也得要改弦更張，肯定各國共黨的獨立自主性。<sup>㉑</sup>

其三、政權和平轉移：東歐國家在民主潮流的洗禮下，共產黨不得不順應民情，陸續舉行自由選舉，還政於民。東德和匈牙利在三月大選中，由共黨脫胎換骨的東德民社黨及匈牙利社會黨，均慘遭敗北，改由中間偏右的保守政黨上臺執政。<sup>㉒</sup>羅馬尼亞、捷克和保加利亞亦在五、六月舉行戰後首次自由選舉。羅共已被解散，不復存在，由保共化身的社會黨以及捷共，根據民意測驗顯示，均不可能贏得多數。因此，東歐國家政權「非共化」的勢頭至為明顯。

### (二) 對中共的影響

東歐變革對中共也帶來相當程度的影響，其影響的面向至少可歸納下列幾點：

註⑳ 聯合晚報，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八日，第十版。

註㉑ 米·謝·戈爾巴喬夫，改革與新思維，中譯本，（北平：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一四三—一四八。

註㉒ 三月十八日東德大選結果，「民主社會主義黨」得票率一六點三三%，名列第三，成爲反對黨，而代表保守勢力的基民黨則獲四〇點九%的高票率，躍升爲執政黨。三月廿五日和四月八日匈牙利二回合的大選中，社會黨得票率落居第四位，僅得一〇%左右，已失去執政機會；代表保守勢力的「民主論壇」則獲四三%高票率，成爲執政黨。

1. 對海外中國民主運動的影響：在巴黎成立的「民主中國陣線」，與東歐國家的民運團體已有密切的聯繫，彼此相互聲援。今年四月，由「民陣」在東柏林發起成立的「論壇國際」，即為明證。

2. 對中國留學生的影響也是深刻的，他們可以親眼目睹東歐國家的變革，使共黨政權和平轉移，而把民主的火種帶回中國大陸。

3. 東歐變革對中國大陸民衆的影響，應該是直接的，而且深刻的。從過去的歷史看來，一九五六年波、匈自由化運動，在大陸即出現所謂「新五四」運動，就是明顯的例證。再者，中共一再干擾「美國之音」和英國廣播公司的華語節目，可見其對東歐民主化現象甚為恐懼。

4. 至於對中共領導階層而言，改革派還是有翻身的機會，畢竟民主潮流是抵擋不住的。東德、捷克和保加利亞，其老一代的領導階層均告垮臺，新一代與老一代打天下的「革命特質」，彼此有代溝，格格不入。再者，堅持史達林主義的威權統治，已在瓦解中，就如羅馬尼亞控制那麼森嚴，齊奧塞斯庫的政權最終由「人民起義」，在一個星期之內即被推翻，可見威權恐怖的統治不是長治久安之計。

### (三) 對我國的影響

至於東歐民主化對我國的影響，可從兩方面來說：首先，就直接影響而言：

1. 增進實質關係：基本上，我國已與匈牙利和捷克達成協議，雙方將在近期内互設商務辦事處。與東德、南斯拉夫和波蘭之間的實質關係，亦有重大的發展，若是東歐依然在共黨的控制下，我國要想發展進一步的實質關係，誠非易事。

2. 擴大接觸領域：過去一年來，我國與東歐國家之間的接觸，甚為頻繁，無論是商務、新聞、旅遊，均有重大進展。最近東歐的音樂團體紛紛應邀來到我國演奏，這都是過去所罕見的。

其次，就間接影響而言：

1. 對東歐共黨的再認識：由於過去我國「反共」教育相當徹底，以為「共黨本質」不可能改變，世界各國共黨均一丘之貉。可是，證之一九八九年東歐的革命性改造，共黨不但能順應輿情，接受改革的要求，甚至拱手交出政權，而且還敢於面對現實，改弦易轍，以更改黨名，制訂新黨綱，來迎接新生。東歐共黨這種石破天驚的舉措，都在在令國人感到意外，引人省思。

2. 刺激學生的民主運動：東歐劃時代的變革，對我國青年學生一反過去，走上街頭，加入社會運動，不無有借鏡作用。今年三月間，中正紀念堂學生的靜坐示威場合中，出現不少類似東歐爭民主、爭改革的標語。我國學生敢於走出校門，反對現行體制，很明顯地，深受東歐國家學生參與反共行列的鼓舞。

3. 執政黨的寬容態度：執政黨對現階段的反對力量，顯然要比以前寬容許多。東歐在民主浪潮的席捲下，羣衆運動如火如荼，共黨不敢於貿然動用武力（羅馬尼亞除外），況且還平反過去的所謂「反革命」運動（如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事件和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均獲平反）。使得執政黨在處理某些反對力量時，採取較寬容的態度，而不致落人口實。